

偉訪談》，《南方都市報》，2006年6月5日。】那麼，不得不說，這樣的問題是缺乏吸引力的。

不過，王著「眼光向下」的研究視角使本書獲得了學術界的很大認可，簡言之，評論者大都認為王著既不失分析的深度，又不乏敘事的趣味性。如上文所述，本書的撰寫有其趣味性的一面，但其分析深度卻似乎有待加強。另外，雖然王著以下層民眾的「街頭文化」為研究對象，但其解釋和分析的方式卻是「自上而下」的，他從上層社會諸如地方菁英、國家政權的干涉來看下層民眾的反應及其所受的影響，而忽視了下層民眾為適應經濟發展要求而進行的自願自覺的改變。因此，雖然作者注意並大量描寫了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但他實際上卻並沒有如有的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做到了「摒棄菁英們的偏見，從下層的眼光來描述成都街頭文化。」【黃敏蘭，〈那消逝了的街頭文化〉，《中華讀書報》，2006年4月5日。】

意大利史學家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erg）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伽利略以來的自然科學的發展使人文科學處於兩難的窘境中——要麼為創造出重要的成果去採納科學性很弱的標準；要麼採用科學性很强的標準卻只能創造出意義不甚重大的成果。」【轉引自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而王著似乎就陷入了後一種窘境，只不過這種窘境的造成並非源於採用「科學性很强的標準」，而在於作者在沒有找到可以代替「公共領域」概念的時候就放棄了對他的使用，由此而造成的畫地為牢後果讓他的分析無法深入，不過，即使我們引入「公共領域」概念來理解此書，我們也會發現由於作者混淆了歷史的「常態」和「變態」，從而使得他的研究也未能證明中國「公共領域」的存在。

孫琦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

松浦章，《清代中國琉球貿易史の研究》，沖繩：榕樹書林，2003年，xiv，303頁。

朝貢貿易在前近代的中國對外關係中佔有重要地位，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但是，目前學術界對於朝貢貿易的研究卻並不如其人意，極少有專門研究明清時代朝貢貿易的專著，管見所及，目前除了張存武的《清韓宗藩貿易》

是研究清朝與朝鮮的宗藩貿易之外，幾乎沒有專門的關於琉球、安南、暹羅等國的朝貢貿易研究專著。松浦章所著《清代中國琉球貿易史研究》的出版，則是對朝貢貿易研究領域的開拓，是研究清代中國與琉球朝貢貿易史的一部力作。

松浦章是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多年來致力於海上交通史研究。此書主要利用近十多年來出版的《中琉關係檔案選編》及其四個續編、《歷代寶案》（校訂本）等一批有關中琉關係的檔案文獻，對清代琉球的朝貢貿易史做了細緻深入的研究。

全書除結論外，分為三部份，共計十章。書的第一部份為序論，主要論述清代中琉關係史。第一章是對中琉關係史研究的學術史回顧，作者認為小葉田淳在中琉關係方面的開拓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而傅衣凌先生等人對福建海外貿易史的研究以及對球商（專門從事琉球貢使貿易的牙行）史蹟的調查在中國對外貿易史的研究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第二章對北京會同館、福州柔遠驛進行研究。各國使節到中國朝貢，由何處進入中國，住宿在何處，受到何種禮節待遇，以及在館驛的貿易狀況，這些問題值得探討。由於文獻中關於琉球使節到中國之後的資料不足以說明這些問題，作者借用史料豐富的朝鮮使節的資料來討論該問題。朝貢使節先由規定的地方進入中國，而後到北京住在會同館，並可以在會同館進行貿易。琉球使節到福州住在柔遠驛，並能够在此與球商進行貿易。而作者也同時指出，北京的會同館與福州的柔遠驛並不是專門給使節的使館，因風漂流到中國的普通民眾也可以住在裡面。

書的第二部份是本論，主要討論清代中琉貿易史的形態。第一章是第二部份的總論，從總體上論述了清代中琉貿易的情況。貢使及隨從可以在在北京會同館、福州柔遠驛進行開市貿易，朝鮮、琉球的開市沒有時間限制，直到他們買完所帶貨物為止。琉球的朝貢船分為進貢船、接貢船、護送船、謝恩船等。作者從琉球貢使帶來的貨物清單上，認為琉球船在嘉道時期所帶來的主要貨物為海產品（魚翅、海參、鮑魚）。清朝對所有貢船裝載的貨物全部免稅。清代規定，從事貿易必須由牙行辦理。在福州從事與琉球貢使進行貿易的牙行被稱為「球商」，共有十家，作者利用地方文獻結合傅衣凌先生等人所作的調查認為這些球商具體是十姓，還是七姓，目前無法知道。他們被稱為「土通事」，在中琉貿易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者還討論了清代冊封琉球中山王的使臣所乘坐船隻的貿易情況。這些船隻所帶之貨物在琉球被稱為「壓鈔貨物」，採取「評價貿易」的方式進行貿易。

整個清代有多少貢船到達中國，這是研究朝貢貿易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作者在第二章主要討論清代琉球貢船的船數。自從明代以來，外國貢使到中國進貢，必須持有朝廷核發的勘合才准予進入港口，否則，不能進行朝貢。琉球貢船也必須遵循這些規定。作者通過排比、計算《歷代寶案》中的貢船的勘合字號，推斷整個清代，琉球的貢船總計為450多艘。通過這些資料，作者認為琉球貢船的數量已經大大超過清朝規定的每次貢船不過三隻，各船人數不過100的制度。

琉球貢船如何在中國進行貿易，這是研究朝貢貿易的最重要部份。作者在第三章中就分析琉球貢船的貿易活動。首先從免過稅銀和清單入手分析了琉球幾種貢船，如進貢船、接貢船、護送船的不同的載重量。隨後對貢船的進口貨物與出口貨物兩類，分別研究了貢船的貨物結構。用列舉清單的方式，說明貢船的主要貨物為海產品，海產品的免過稅銀佔全部貨物免過稅銀的90%以上。作者還用20世紀初日本出版的《通商匯纂》中的日本福州領事的報告，論證朝貢貿易在地方上帶來的影響。琉球所產的酒在清末當時的福州市場上很受歡迎。貢船出口貨物主要為羽毛緞、畢幾緞以及人參等，還有中國的藥材、砂糖等等。作者通過《英話注解》認為羽毛緞、畢幾緞等貨物為英國所產，由此看來，這些貨物可能是從廣州運到福州的。

第四章討論冊封使節所乘坐的船隻。據作者考證，明代的冊封使乘坐的船隻（封舟），是在每次冊封之前才按照福船的樣式開始製造的，而清代第一次製作冊封使乘坐的船隻竟然耗時四年。朝廷認為製造船隻耗費過大，時間過長，因此，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以後，冊封使乘坐的船隻一般使用商船或兵船。

貢使乘坐船隻帶來貨物到中國進行貿易，反過來，冊封琉球中山王的清代官吏也不會放過這個牟利的機會，他們會在封船上裝滿貨物運到琉球。第五章主要就是研究冊封使所帶貨物的「壓鈔貿易」。冊封使者在赴琉球之前，會在國內置辦琉球需要的貨物運到琉球銷售。琉球把使者乘坐的船隻稱為「冠船」，也可以稱為冠船貿易。明代規定渡海兵役均可帶百斤貨物到琉球交易。其實也是以此作為壓艙的物品，以此作為船隻安全的保障。清代對琉球的冊封總共有8次。冊封使者一般會帶藥材等琉球需要的貨物。但是，據作者的研究，這些貨物往往在琉球很難全部銷售出去，冊封使者只能又把貨物運回國內。

第三部份為附論，討論清代琉球朝貢貿易帶來的各種影響。作者在第一章中關注的是海產品輸入中國的問題，由於沒有清代琉球的海產品生產的史

料，作者只好借助日本政府自明治時期以來的關於琉球漁業狀況調查的史料推測清代時期琉球海產品的生產規模。琉球海產品大量流入中國，他的消費狀況如何？這是研究者更為關注的問題。作者利用19世紀末以來編輯出版的一些商業貿易書籍，分類討論了海參、乾鮑、魚翅、海帶菜四種主要海產品的流通狀況。第二章討論中國茶葉出口到琉球的問題。清代時期，中國茶葉自乾隆年間輸入琉球之後，每年都有幾萬斤茶葉進入琉球。而這種狀況造成在琉球廢藩置縣之後，福建產的茶葉在琉球還有很大的市場，日本本土出產的茶葉一時難以與之競爭。

以上只是對兩類貨物之流通產生的影響作了分析，貿易發展對沿海的地域社會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作者在第三章中討論了清代福建地域社會與東亞海域交流的問題。他首先利用清代閩海關的黃冊、閩海關常稅則例以及硃批諭旨中關於商業活動的史料，以實際例證說明福建沿海的航運活動以及與腹地有關的商業活動。其次，他還利用海關十年報告，研究了福建沿海的商業活動，這些商業活動與各地聯繫緊密。作者也使用了乾嘉時期東海商船被劫的史料和史料中的奏疏論證福建與各地繁忙的商業交流，討論琉球需要的貨物是怎樣從各地運到福州的。

研究海上交通史，最困難莫過於史料的缺乏。由於海上交通的史料本來就比較少，而且又分散在不同的國家與地區，利用起來非常困難。作者把分佈在北京、臺北、以及日本的有關史料幾乎全部搜集到，用細緻綿密的功夫閱讀材料，分析研究問題。這是本書非常明顯的特點。

作者把琉球的朝貢貿易與冊封使臣所帶貨物到琉球進行貿易的問題結合起來考察是本書的另一個特點。學者在注意朝貢貿易的同時，可能往往會忽視與冊封使臣有關的問題，如乘坐的船隻，以及他們帶來的貨物等。冊封使臣所帶貨物在琉球進行貿易，被琉球人稱為「評價貿易」，這種貿易是對朝貢貿易的一種補充，也是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視的問題。作者專章就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這是他對朝貢貿易研究做出的一種推動。

注重朝貢貿易帶來的影響是本書第三個特點。200年來的朝貢貿易必然會對福州與沖繩的地方社會的消費產生一些影響，作者利用不是很常見的日本史料對這個問題做了細緻研究，讓讀者明瞭茶葉對琉球，以及海產品對中國各地的飲食習慣的影響。

讓人感覺意猶未盡的是，作者沒有引入琉球與薩摩藩的關係。由於琉球自1609年以後與薩摩藩的特殊關係，琉球在保持與清朝的朝貢貿易的同時，還與薩摩藩保持關係。如果把薩摩藩的一些情況引入進來，可能更能夠顯示

出琉球與清朝朝貢貿易背後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焦鵬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